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 特色——以《愛廬小品》為例

王偉勇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要

本文以黃永武教授散文集《愛廬小品》為例，分析其「言而有據」的寫作特色，可包含三方面：其一，考釋字詞，如在散文中考釋「遇」、「跨竈」、「貨色」、「白賊七」等字詞，並據以鋪陳文章。其二，徵引故實，如寫人之自蔽，而引子貢見孔子為例；寫〈愛廬的一日〉，而引陶淵明「吾亦愛廬」句；寫「向水學習」，而引老子、孔子論水的言論；寫〈讀書與涉境〉，引龔自珍與魏源的故事等，皆是其例；其三，辨識名物，如寫〈賞花心情〉，舉出菊花之品種有「冷香博士」、「醉西施」、「青雲佳士」等；寫〈忍者龜〉而區辨中國人與日本對龜命名的看法；寫〈撲滿〉及〈龍〉，即辨明「撲滿」與「龍」之來龍去脈等。凡此，皆充分顯示黃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特色，足以啟發中國文學系出身之學者或作家，發揮一己之長，從事散文寫作，以及藉散文發揚文化教育之思考。

關鍵詞：黃永武、愛廬小品、言而有據、散文、小品文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特色
——以《愛廬小品》為例

A Case Study on Professor Huang Yong-Wu's Allusive Writing Features: the Analysis of Ai Lu Xiao Pin

Wang Wei-Y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analyzes Professor Huang, Yong-Wu's allusive writing feature. Huang's collection of short prose, *Ai Lu Xiao Pin*, is used as the primary source and thre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

1. He studies etymology and writes essays on his findings of the origins of the words “Yù”, “Kuà Zào”, “Huò Sè” and “Bái Zéi Qī”.
2. He uses a vast variety of historical allusion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s. He alludes to Zigong's meeting Confucius to argue humbleness. One of his short prose titled *Ai Lu De Yi Ri* (*A Day in My Thatched Shack*) derives from Tao Yuanming's line “I too love my thatched shack”. In *Xiang Shui Xue Xi* (*Learning from Water*), he mentions Lao Zi's and Confucius'



arguments concerning water. He cites Gong, Zizhen's and Wei, Yuan's stories in *Du Shu Yu She Jing (Reading and Real-life Experience)*.

3. He is good at identifying things. In *Shang Hua Xin Qing (Viewing Flowers)*, he introduces several sorts of Chrysanthemum such as “Lěng Xiāng Bó Shì”, “Zuì Zī Shī” and “Qīng Yún Jiā Shì”. In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 he analyzes Chinese and Japanese different logics of turtle nomenclature. In *Porcelain* and *Dragon*, he explains the origins of these two titles.

For those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background, be it scholars or writers, Huang's highly allusive style serves well to urge them to work on proses and ponder how to promote culture education via prose.



一、前言

二百多年前，清代姚鼐（1731—1815）於〈述菴文鈔序〉中曾說：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為貴。¹

此序清楚指出學者要能兼長「義理、詞章、考據」為貴，三者不可偏廢，否則必有「寡聞而淺識」、「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之缺失。然歷來能幾於此境者幾人？即以曾國藩（1811-1872）〈聖哲畫像記〉所舉三十二位聖哲為例，他認為「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²其它二十四位聖哲，則不能無偏，所以他接著說：

¹ 姚鼐：〈述菴文鈔序〉，收錄於《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卷4，頁61。按：清·戴震（1723-1777）於〈與方希原書〉（見錄於《戴東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臺二版，卷9，頁101），則提出「理義」、「制數」、「文章」，為學問之途；翁方綱（1733-1818）〈吳懷舟時文序〉（見錄於《復初齋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卷4，頁198），亦提出「義理之學」、「考訂之學」、「詞章之學」三項，均可取之與姚氏主張相發明。為求與下引曾國藩使用的術語接軌，本文一律採用「義理」、「詞章」、「考據」三名詞。

²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文正公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5月），頁120。



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³

可見一位學者要兼備「義理、詞章、考據」，何其困難！在曾國藩眼中，大家所熟知的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等人，僅擅長「義理」；韓愈、柳宗元、歐陽脩、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等人，僅擅長「詞章」；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等人，僅擅長「考據」。唯有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莊子、司馬遷、班固才是兼備三者的人物。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引發文學革新之後，使用白話文的呼籲，已然銳不可擋。於是學者又多了是否投入新潮流，用白話文創作的掙扎；甚至以「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國故之呼籲，也教學者多了一種選擇。就在這銳變的時代裡，我們看了一群熱血沸騰，關心國家前途，企圖振興國魂的知識分子，他們不論專擅中國文學或西洋文學，基本上都具備了深厚的國學素養，且不排除使用白話文，因此出現了不少學者型的作家，揮動著彩筆，寫出有內容、有依據、有文采的作品，引領風騷。此中或許有些人過於急切，過於浪漫，甚至不懂政治環境的複雜，而做了不同的選擇，但他們「救亡圖存」的原始初衷，仍值得大家去探究。

民國三十八年（1949），中國政局丕變，臺灣意外來了一批學術菁英；同時因著政府採行西方教育制度，推動文化復興運動，中國文學系的課程，仍朝經、史、子、集兼顧的架構來設計。當時的年輕學子，一則有機會親炙大師，一則也頗以傳承「固有文化」自許；同時還能接受白話行文的方

³ 同前注。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特色
——以《愛廬小品》為例

便，運用它來寫作，因此以「義理、詞章、考據」兼備來期勉、呼籲，尚能得到不少認同，也的確出現這類型的學者。直到民國九十年（2000）以後，隨著第一批來臺學者的逐漸凋零，有機會親炙他們的第二代學者又陸續退休，加上電腦「新科技」走進了我們的生活，走進了各行各業，整個世界又再度徹底改變。教育制度一變再變，教人措手不及；學科越分越細，越細越專，「能此不能彼」的現象，與日俱深。多數學者只能在自己的學術圈內自得其樂，卻站不上媒體，揮不動椽筆來改善社會風尚而徒呼負負；多數作家也盡寫些迎合媒體大眾需求的文章，渾不管經世濟民，遑論「義理、考據」！於是「爬到樹上採草莓」、「王昭君曾到金門」、「楊家將率領宋軍對抗金人」、「《史記·遊俠列傳》記載燕太子丹砍了美人的手給荊軻」等內容，都可以出現在名學者、名作家的文章中；甚至某學者兼作家在文中提到其座右銘是胡適的「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⁴，還有人把「不能自己」寫成「不能自己」，並斬釘截鐵的說：「現代文學的作家都這樣用！」真教人啼笑皆非。姚鼐稱：「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⁵，顯然一點不差！

幸好學者兼作家，只是逐漸老去，並未全然凋零。第三代、第四代的學者大可不必氣餒，只要願意騰出一些寫論文的時間，也還可以藉著教書的場域，或親自撰寫，或呼籲下一代的學子，在有限的時間內，選擇可讀的散文，指出向上之路。那麼，黃永武教授的散文，便是可以積極推薦的典範！

⁴ 兩句係出自宋·王安石〈登飛來峰〉：「飛來峰上千尋塔，聞道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此七絕見錄於《臨川集》（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冊二，卷34，頁9。

⁵ 同注1。



二、黃永武教授為什麼可以成為典範？

黃永武教授為什麼可以成為典範？就得先從他問學的工夫說起。黃教授於 1958 年進入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1962 年進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研究，道地科班出身。碩士論文是《形聲多兼會意考》（民國五十三年，1964），博士論文是《許慎之經學》（民國五十九年，1970），這種研究進程，符合「欲治聖經，先通小學」⁶的定律；這種論文寫作訓練，則必須建立在「考據」的工夫上，才能提出自己的論點，呈現研究的成果，這就屬於「義理」的層次。至於「詞章」，我們的確很難根據這樣的論文來下評論。但民國六十五年至六十八年（1976—1979），黃教授連續出版了《中國詩學·設計篇》、《中國詩學·鑑賞篇》、《中國詩學·考據篇》、《中國詩學·思想篇》四本書，用流暢的白話文，處理了研究中國詩學所必須注意的論題，就很能教人領教他「詞章」的工夫。而且在「義理」（思想）、「詞章」（鑑賞）、「考據」之外，又增加了「設計」一項；這是他《字句鍛鍊法》（民國五十八年，1969）寫作理念的擴充，更是桐城義法觀念運用於研究詩學的領航人。姚鼐〈復魯絜非書〉稱：「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捨、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⁷此中所稱「布置」云云，即是「設計」。黃教授或有鑑於今人去古日遠，前人精心設計的章法，未必盡能領略，所以特別補充了這一項。果不其然，今日「修辭學」、「章法學」已成為顯學；不但為學界所研究，也被大、中、小學教師普遍運用於國文教學上。回顧黃教授《中國詩學·設計篇》的撰寫，顯已洞燭機先；畢竟他曾在學校任教，就更能了解學生學習、研究的癥結所在。爾後又出版了《詩與美》（民國七十三年，1984）、《抒情詩葉》（民

⁶ 清·劉寶楠（1791—1855）：〈問經圖序〉，收錄於《念樓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稿本），1974年），卷6，頁272。

⁷ 姚鼐：〈復魯絜非書〉，收錄於《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卷6，頁94。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特色
——以《愛廬小品》為例

國七十四年，1985）、《敦煌的唐詩》（民國七十六年，1987）、《讀書與賞詩》（同前）、《詩香谷》一、二集（民國八十一年，1992）、《愛廬談文學》（民國八十二年，1993）、《愛廬談諺詩》（民國八十八年，1998）、《詩與情》（同前）等，都是給愛好中國古典詩學の後進閱讀的。

但如同「前言」所述，讀書人原有「淑世濟民」、「兼善天下」之責任。所以學者面對世風日下的時代，如何走出校園，走出教育界、學術界，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尤其被現代人視為「老夫子」的中國文學系教授，要如何拿捏「出手」寫作的分寸；也就是不失學者身分，又能寫出被普羅大眾接受的文章，的確需要琢磨。清·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曾說：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四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⁸

以這樣的標準來衡度學者「出手」寫作的分寸，我認為是很可以做為指標的；而黃教授的散文，給我印象，就是這個樣子。我們試讀他的散文集，如《愛廬小品》（民國七十九年，1990；分靈性、生活、勵志、讀書四冊）、《愛廬談心事》（民國八十五年，1995）、《生活美學》（民國八十六年，1997，分天趣、諧趣、情趣、理趣四冊）、《我看外星人》（民國八十九年年，2000）、《山居功課》（民國九十年，2001）、《黃永武隨筆》（民國九十七年，2008，分寫景、記學、說理、關情四輯），就可以發現它真的可以砥礪志氣、淨化人心、修養性情、增廣見聞，足以作為「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這句話的注腳，所以我說：黃教授殊堪做為學者作家的典範。

⁸ 顧炎武：《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收錄於《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卷21，頁547。



三、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特色

閱讀黃永武教授的散文，所以有前述的功能，除內容外，他的筆觸也是關鍵所在。姚鼐在〈復魯絜非書〉中曾說到：

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濼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煥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⁹

以此標準來衡量黃永武教授的散文，總體而言，也是屬於「陰柔之美者」；但他絕無「濼乎其如歎」、「愀乎其如悲」的況味，畢竟他是發明飛機，而不是發明降落傘的人。¹⁰他的筆下總是帶著歷史的厚度與哲理的深度，感性、理性兼備，從容優雅，溫柔敦厚，具有詩的興味與趣味；¹¹且篇幅不長，方便閱讀。他的散文如春風，如秋陽，足以溫暖人心；如清泉，如明鏡，足以洞鑑人性；如暮鼓、如晨鐘，足以清醒世人。尤其他不侈言教化，而教化自在；他不標榜道理，而道理自明；他不賣弄學問，而學問自見；他不炫耀詞采，而詞采自斐。所以如此，總緣他有著關心環境的真性情，有著自然抒發的妙筆觸，才能有此境界。¹²至於他的文章所以能取信

⁹ 同注 7，頁 93。

¹⁰ Gil Stern, "Both optimists and pessimists contribute to our society. The optimist invents the airplane and the pessimist the parachute." *Worth Repeating: More Than 5,000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Quotes* (Grand Rapids, 2003) by Bob Kelly, p. 252. 中譯為：「樂觀者和悲觀者對社會都有貢獻，樂觀者發明飛機，悲觀者發明降落傘。」

¹¹ 《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見於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80 年 1 月）卷 26，頁 1。

¹² 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見錄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2 月），冊五，頁 4240）。又云：「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同



於讀者，則在他以「考據」工夫延伸出「言而有據」的寫作特色，這是中國文學系教出來的看家本領，也是其它作家難望其項背的。茲以黃教授於民國八十二年（1993）榮獲散文類國家文藝獎的《愛廬小品》¹³為例，分類舉例說明其「言而有據」的散文特色：

（一）考釋字詞

我們在閱讀散文的時候，極少見到以解釋方式入文的；即使有人用它，讀來卻味如嚼蠟。黃教授的散文則不然，他時常發揮中國文學系學習的專長，巧妙的將字詞解釋融入文中，形成他散文的極大特色，如：

- 1、「遇」字的意思，不僅是「相會」，而是指「相待」「相偶」，真正的遇，是指情投意合，心志相得。更進一步，是以禮相對待，備受重視的「禮遇」。大部分人談懷才不遇，這「遇」字的涵義很狹小，專指事業上有沒有人賞識擢拔，工作上稱不稱意而言，其實人生幸運的「遇」，不專指事業工作的。（《靈性·談「遇」》，頁147）
- 2、古人有跨竈的期待，至今仍存在。竈上有釜，釜父音近，跨是越過，跨竈是期待子孫勝過父祖，使門楣光彩。（《生活·養兒的好處》，頁100）
- 3、「貨色」二字中原來是充滿著玄機的，不單是指貨品的等第，而是指人生的關卡。
「貨色」二字成了人物內涵的品質，「什麼貨色？」居然可以指這

前，頁4249）

¹³黃永武：《愛廬小品》（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2年7月）。此書凡4冊，附標題分別為〈靈性〉、〈生活〉、〈讀書〉、〈勵志〉，為省篇幅，以下引文逕標附題及頁碼於後，不再一一附注。



人的品格、才能、性格等等綜合的分量。其實「貨色」一字最早見於《書經》，貨是指貨財，色是指女色，貨財包括了飲食，女色包括了男女，貨色乃是指人性基本需求的飲食男女……（《勵志·什麼貨色》，頁 153）

4、「白賊七」是一句很生動的本省方言。賊都是趁著夜晚摸黑而來，而瞪著眼睛說瞎話的人，簡直目中無人，無所禁忌，就像白天做賊，所以叫白賊。但為什麼又加個七字呢？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無意間在《學海叢書》中有一本叫《袖中錦》的小書裡，讀到一則記載：「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蓋搭子者，女傍著子為『好』字；七者，謂其不成婦女也！『七』字不成『女』字」

原來臺灣話裏的七字，乃是淵源於宋代京師流行的話呢！七字比女字少一撇，所以把不成樣的女人叫「七」！後來引申為不像樣的人都加個七，「白賊七」的語言由來，也和我們血緣的由來一樣，共飲中華文化的長江大河，句句都是源遠流長的呢！（《讀書·白賊七》，頁 162）

以上四個例子，「遇」、「跨竈」屬於雅言，「白賊七」是方言，「貨色」則介於雅言與俗言之間。黃教授信手拈來，不費吹灰而興味盎然。所以有這樣的效果，我認為有四個原因：一、黃教授有著敏銳的「心眼」，總能掌握廣大讀者的興味，找到雅俗共賞的題材，或化腐朽為神奇，或引新知以啟智慧，真能到達朱熹所稱「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¹⁴的境地。二、黃教授在解釋這些字詞的時候，已然將字意與人生閱歷合而為一，

¹⁴ 宋·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德義風流宿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見於南宋·朱熹撰、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卷4，頁405。



因此總能越出字書的框架，引伸出圓融剔透的道理，而不是「拷貝」的字書。上舉解釋「遇」、「貨色」，即具此特色。三、黃教授在解釋的同時，又常帶入文化知識，教讀者可以「增益其所不能」¹⁵。因此凡是想要「日知其所亡」¹⁶、具有上進心的人，一定期待閱讀他的文章；讀罷也必然會有「原來如此」的心得，進而產生閱讀下一篇的期待。上舉解釋「跨竈」、「白賊七」即具此特色。四、除了「心眼」，除了學養、閱歷，黃教授還有一枝靈動幽默的筆，也值得一提。因為靈動，才不致把字詞解釋搞得像「拷貝」字書；因為幽默，才不致因夾雜考據使得文章索然無味。但我要強調的是黃教授的幽默是點到為止，讓讀者會心一笑，他絕對不會因「技」害「道」的！

（二）徵引故實

學者寫論文既強調「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¹⁷，因此「徵引故實」，似乎是學者的本能。這種本能運用在待人接物，易流於「炫才」、「酸腐」；運用在寫作散文，易流於「匠氣」、「凝滯」，但黃教授筆下，卻充分凸顯了中國文學系學者「引經據典」的特質，充滿書卷氣。如：

- 1、據王充《論衡》的記載，子貢起初事奉孔子，第一年還認為孔子不如他呢！到第二年勉強承認孔子和自己差不多，一直到第三年，才自己漸漸覺得不及孔子！
自蔽的障礙如此重，人要能相知與欣賞，談何容易。（《靈性·

¹⁵ 《孟子·告子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見於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1月）。

¹⁶ 《論語·子張》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見於《論語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1月）。

¹⁷ 此乃胡適名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



削圓方竹杖》，頁 157)

- 2、陶淵明說了一句：「吾亦愛吾廬」，哇，真迷人，明朝就有人把廳屋叫「吾愛廬」，清朝也有人把居室叫「愛吾廬」，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把這山中的柴扉野屋，叫做「愛廬」(《生活·愛廬的一日》，頁 13)
- 3、地水火風，水是構成大千世界的要素之一，隨處展現在眼前，有時水流動，有時水滄蓄，老子看了就說：「最妙的就是水，它簡直就是道！」孔子看水也激動地大叫：「水哉！水哉！」表示他內心美妙得難以形容的讚歎。(《勵志·向水學習》，頁 9)
- 4、清人龔定盦曾為大學問家魏源在揚州的絜園題了一副楹聯稱頌他：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
不過，明人董其昌在〈畫旨〉中早已用這二句話，來說明繪畫要有「氣韻」，必須讀萬卷書，才能脫去胸中的塵濁，又須行萬里路，才能內營胸中的丘壑。……
漢代的司馬遷，已證明遠遊搜采對作文極有益。唐代的杜甫，亦證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對作文亦有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對文藝的精進是不容置疑的，……(《讀書·讀書與涉境》，頁 13)

以上四個例子，第 1 例引「事典」，第 2、3 例側重引語典，第 4 例事典、語典兼備。寫文章徵引故實，原有取信於人，證明自己所言不差的作用。尤其「事典」本身具備故事性，本來就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因此善加利用，頗有加分效果。我們以所舉四個例子，檢視黃教授「徵引故實」的手法，可歸納出四個特色：一、凡事典，黃教授都能先消化其事，再用自己的語言，生動表達，讓人的確在讀散文，而不是讀論文。二、黃教授引語典，除非必要(如第 2 例引「愛廬」出自「吾亦愛吾廬」，第 4 例引對



聯)，否則一律譯成白話以行文，務期一氣呵成。三、不論引事典或語典，止於點出作者、書名，作者、篇名，或朝代、當事人，絕不落入「朝代、作者、書名、篇名、卷數、頁數」俱全之窠臼，而成了學術論文。四、黃教授凡舉兩個證據以上，一定依朝代先後排序，如第2例先陶淵明（晉）次明人，次清人；第3例先老子再孔子；第4例先由清人上溯明人，先舉漢代司馬遷，再舉唐代杜甫，皆是明證，這也是學者的基本工夫：有條不紊。

（三）辨識名物

讀黃教授的散文，發現他常將蟲鳥木石，乃至枕椅瓶竈等瑣屑的題材寫入文中；而且具有博學的涵養，通透的見識，才能古今事物兼容，絕不貴古賤今。如：

- 1、菊花中淨白而品雅的叫「冷香博士」，粉紅品雅的叫「醉西施」，小花超瓣銀紅色的叫「青雲佳士」，又或者叫「鵝黃佛座」、「紫祥雲」、「錦心綉口」，名稱裏就帶領你去珍惜去崇拜。牡丹裏的「萬山積雪」、「雪塔」、「祥光罩玉」、「嬌容三變」，都把花的幻情天趣欣賞得十分傳神，而俯仰高下四面看來都絕美，還帶點楊妃膚色的叫「四面觀音」，更教人合十禮拜了。（《靈性·賞花心情》，頁177）
- 2、稱為「龜」，絕無惡意，中國人將龜列為四靈之一，龍鳳麟是儒家的偶像，龜則是道家的偶像。莊子稱讚溝瀆中曳尾龜的逍遙自得，白居易一直自比為老龜，大意是要忍耐卑微的角色，以安詳退讓作為處境的方法。唐朝人崇拜佩金龜的「金龜婿」，把龜裝成金的，作為富貴的象徵，大失忍者的涵養了。然而日本這隻忍者龜，現在也富甲天下，早成為富貴的金龜，



我們必須知道：忍耐的本身就是對自己的殘忍。所以以忍耐與殘忍往往是一體的兩面，懂得忍耐的人發起狠來，比常人尤加殘忍，……（《生活·忍者龜》，頁 153）

3、撲滿是中國人發明的，雖然在出土的周秦古物中，還不曾見過撲滿，但根據古籍記載，漢代已有了撲滿，當時以黏土製成罐形，罐背有一個竅，只能進，不能出，儲存以後就必須將它敲破，才能把錢取出。土是粗賤的質料，錢是貴重的財貨，暗示許多粗傢伙只知積錢聚斂，就像「土器」自以為可以吞「金」一樣，哪曉得金錢被積滿的一日，也就是自己被砸破的一天！想到那麼多錢，誰會去憐惜那個土罐？中國人就在這件小小的雜物中，寓下了深長的哲思。（《生活·撲滿哲學》，頁 180）

4、龍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呼風喚雨的神物，也是帝王人傑的表徵。從《易經》開始，颺就是如此被神化了的。在故宮作研究工作的幾位朋友，都一致認為龍是想像的產物，是某部落創造的圖騰，地球上根本沒出現過中國的龍。他們認為：「所謂龍，就是雷電，雷電閃光後發生隆隆的聲音，那閃光的形象就是龍，命名就和雷聲一樣喚作龍。」堅持的理由是：七千萬年前龍就絕種，數百萬年前才有人類，人類絕無看見龍的機會，在先祖經驗的傳承中也不可能有龍。

我對這種說法一直存疑，……古代人最早於何時見過龍的化石？由於缺乏記載，尚難斷定，但在《本草》一書中已有「龍骨」入藥，《本草》入藥的龍骨，與清代人誤以殷墟出土的龜甲為龍骨是不一樣的。我在明代人姜南的《墨畬錢縛》一書中讀到：「龍骨，龍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為蛻，也見《本草》。按《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由此言之，信乎龍之骨，蛻骨也。」那時殷墟龜甲並沒出土，明代人相信龍骨是像蛇蛻皮一般，龍是蛻了一次骨，就長大一次的，龍蛻下了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特色
——以《愛廬小品》為例

全身的骨，骨架仍按生前排列成形；其實這不是蛻骨，而是恐龍的化石，從《本草》到明代人，一定陸續有人發現過恐龍的化石，拿去當藥物了。（《讀書·說龍》，頁 125-126）

以上四個例子，第 1 例教讀者領受賞花的雅趣，而這雅趣基植於古人對花的取名，經黃教授導引，自可加深今人賞花的興致。第 2 例由日語「忍者龜」，引介古人對「龜」的看法，同時導出「忍」字的重要；並藉「以古鑑今」的手法，呼籲世人對日本的警覺，真是語重心長啊！第 3 例考述古人設計「撲滿」的智慧，導出「哪曉得金錢被積滿的一日，也就是自己被砸破的一天」的結論，寓意深遠。第 4 例對於今人談「龍」的看法，舉古書記載予以質疑，為研究「龍」的人，提出另一種思考。¹⁸但黃教授對今人的學術見解，如有新發現，也會予以支持的，如底下這段記載：

我想特別一提的是蘇先生在神話方面的獨特見解，她先發現《楚辭》中的「國殤」為無頭戰神，與希臘的火星為戰神相似，又發現〈九歌〉是整套神曲，九歌各歌主是隸屬於同一集團之神，九歌乃祭九曜之歌，如湘夫人即金曜之神維娜斯，大司命即死神……用比較神話的方法，證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讀書·神話成真》，頁 122）

文中提到的蘇先生，就是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已故教授蘇雪林先生，當她用宏觀的視野講說《楚辭》，並推論中西交流早在戰國時代就存在的時候，多少人嗤之以鼻。但隨著「三星堆」¹⁹、「金沙遺址」²⁰等地下文物的出土，證明三千年前，四川原是一片大草原，西方人已然抵達東土的事實；以及出土文物與《楚辭》的記載可以印證的時候，蘇先生的說法，真不是

¹⁸ 參考楚戈：《龍史》，（袁德星（楚戈）自行出版，2009 年 2 月）。

¹⁹ 參考吳紅、季元龍著：《天問三星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 年 4 月）。

²⁰ 參考岳南著：《考古中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年 4 月）。



空穴來風，也終有被印證的一天。相較於其他人的質疑，黃教授早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就寫文章重視它，眼光之遠，見識之廣，與一些「保守人士」相較，誠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就是本文所以誇讚黃教授「辨識名物」，兼容古今的原因。

四、結語

本文首先定位黃永武教授是學者作家的典範。就學者言，他是中國文學系科班出身，在大學裡擔任過主任、所長、院長、教務長等行政職務，案牘勞形，可以想見；但他卻著述不斷，若非擅長「時間管理」，絕難做到。就後者言，學者從事創作，常犯拾人唾餘、好掉書袋，以致文難卒讀的缺失，但黃教授卻化「缺失」為「優勢」，將學者「考據」的工夫，運用在散文中，形成他的特色；在現代散文作家中，可謂絕無僅有。他自己曾說：

作家重在創作；學人重在研究。創作出於自發，要憑空創造出靈動的文字；研究出於對象，要據實查證出真切的原委。作家厭惡拾人唾餘，蹈襲剽竊都成忌諱；學人則必須時時掉書袋，句句加註腳，一失去依傍就成空言胡說。所以作家即使鎔裁別人的思想，重在自我的發揮，引書多了就嫌雜，多用別人的話就算墮落；而學人全靠學力的深厚，重在資料的掌握，引書少了就嫌漏，在援引之中就代表一種判斷。因此作家是鎔裁別人來造就自己的；而學人是獻出自己來彰顯前人的。（《讀書·大師與大手筆》，頁 21-22）

或許有這樣的見地，所以黃教授以學者的身分投入創作的時候，才能取兩者之長而避其缺失了。接著，本文強調做為一個學者作家，黃教授兼義理、詞章、考據三方面的涵養，所以能運用中國文學系訓練的工夫，寫出「言而有據」的散文；同時，分考釋字詞、徵引故實、辨識名物三部分，舉例證明本文也是「言而有據」。只是這樣的文章特質是否能夠被這個時代



析論黃永武教授「言而有據」的散文寫作特色
——以《愛廬小品》為例

的讀者普遍接受，我想黃教授必然考慮過，但他卻不曾刻意經由推銷管道，非把它炒作成「排行榜暢銷書」不可。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有一段話說：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²¹

因此，身為學者作家，鑽研中國文學的學者應該繼承黃教授以文淑世的精神，知所堅持；也應該學習他的文章，薪傳他的感性、知性與幽默，發揚學者作家的特質。尤其黃教授已退休移居加拿大，閱歷更廣，空閒越多，必然能蒐集更多的天下奇聞，形諸妙筆；並藉電子媒體或網際網路，分享雅趣、妙理與智慧給沉溺其中的普羅大眾，那將是許多後學之福。我們深深期待！

²¹ 楊榮祥譯注：《方苞／姚鼐文》（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頁187—188。

